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阅微草堂笔记》与大运河文化

付红妹

(沧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 河北 沧州 061001)

摘 要:《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鸿儒纪昀晚年所作一部文言笔记志怪小说合集,记录了纪昀及其亲友的所历所见所闻所感。大运河是《阅微草堂笔记》主要的写作对象,为作者提供了大量写作素材,影响了《阅微草堂笔记》内容诸要素的生成。《阅微草堂笔记》是研究大运河文化的重要文本,其内容及传播,又丰富充实了大运河文化。在文学地理学视域下《阅微草堂笔记》与大运河文化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阅微草堂笔记》; 大运河文化; 文学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910(2020)03-0010-04

《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简称《笔记》)是清代鸿儒纪昀(1724-1805)晚年所作的一部文言笔记志怪小说合集,由《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及《滦阳续录》5部分组成。全书共计24卷,1200则故事,约40万字。这5部笔记是纪昀66岁至75岁之间十年心血的结晶。嘉庆五年(1800),由其门人盛时彦在得到纪昀应允并亲自审读后为之校订合刊,以纪昀北京宅邸的斋号命名为《阅微草堂笔记》。

《笔记》为纪昀“追录旧闻”之作,记录了纪昀及其亲友的所历、所见、所闻、所感。故事的发生地主要有三处:京杭大运河流域、京师官场、新疆,其中大运河流域故事所占比重最大,据不完全统计约为500多则,几近全部故事的一半。大运河是《笔记》主要的和重要的写作对象,不仅为其提供了大量写作素材,还影响了《笔记》的内容诸要素及艺术风格的生成。同时,《笔记》也是研究大运河文化的有力文本,其内容及传播又丰富、充实了大运河文化。在文学地理学的视域下,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此语境下的地理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并且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来影响文学作品的思想、情感、景观、实物、人物、事件、语言和风格等^[1]。我们将主要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相关理论来探寻《笔记》与大运河文化之间双向互动的密切关系。

一、大运河文化的特点及其精神内涵

京杭大运河,南起浙江杭州,北至北京通州,全长1700多公里,最初,春秋吴国为伐齐国而开凿,隋朝大幅度扩修并贯通至都城洛阳且连接涿郡(今北京),元朝翻修时弃洛阳而取直至北京,开凿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京杭大运河贯通中国南北,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省市,连接海河、黄

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大运河的开通，打破了中国只有东西方向水路的格局，使东西南北各方的人都将各自家乡的文化带到了运河流域，像宗教信仰、科学技术、衣食住行、文学艺术等，增强了不同区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使不同品格的文化兼容并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运河文化。大运河文化既包括大运河流域的物质遗迹，也包括与大运河有关的精神遗产，“是大运河流域若干历史时期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文学艺术和价值观念等因素的沉淀，即以黄河流域文化为核心，紧密融合海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流域的文化之后所形成的独特文化。”^[2]大运河处于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京畿文化随着运河的流波而相互渗透，对于中华文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水乳交融具有催化作用。大运河文化在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对话、融合中，充分吸收了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丰厚营养，形成了自身多样性、包容性、开放性并存的鲜明特征。大运河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形塑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一，其精神内涵必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框架之内。

二、大运河文化对《笔记》的滋养

（一）大运河文化塑造了作者纪昀的童年经验

纪昀，字晓岚，又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老人、孤石老人，直隶河间府献县崔尔庄（今属河北沧州市）人，人称纪河间，自署亦称“河间纪昀”。纪昀历经清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为《四库全书》总纂官。关于纪氏家族的资料，现存以《景城纪氏家谱》记载最为详尽^[3]。纪氏一世祖椒坡公于明永乐二年自应天府上元县（今南京市江宁县）迁至献县景城落户（在今沧州市崔尔庄西三里），至纪昀祖父纪天申时因子孙繁衍而徙于崔庄（当地人俗称崔尔庄）。雍正二年（1724），纪昀生于崔庄，十一岁（1734）时随父入京。纪昀是在距运河不远处的那个村庄度过了他整个的童年。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童年是人的一生中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童年经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不可逾越的开端，人的一生都要受童年“基本选择”的影响。所谓童年经验，“是指一个人在童年（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儿童时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情感、知识、意志等。”^[4]这里的童年经验绝不等同于单纯的童年经历，而是指经历后有所收获和让人回味的那部分内容，更确切的叫法应该是“童年体验”。在心理学领域，尽管各学派之间存在很多分歧，但都很重视童年经验对个人成长和个人体验生成的意义，认为童年经验是人类个体发展的宿因，对艺术家尤其如此，那些童年时期感受深刻的经验，往往给艺术家的一生涂上特殊的底色，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艺术家对于作品题材的选择、价值取向的确立和情感或情绪的基调。这种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在很多艺术家和作品身上都得到了证明和体现：童年经验或是作为题材直接进入作品，或是作为先在意向结构对创作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或是成为创作的动力源。纪昀的童年经验亦可作如是观。纪昀的出生地崔庄，清代属河间府献县管辖，与沧州分属两府（清雍正九年，沧州属天津府），但在地理位置上距离运河岸边的沧州较之河间、献县都近，况且其外祖父家就在运河岸边，“先外祖居卫河东岸，

有楼临水旁，曰度帆。”^[5]文中所言卫河即是大运河。纪昀自家亦有庄园在运河岸边，他儿时常随祖母、母亲在此避暑，《笔记》载：“余有庄在沧州南，曰上河涯，今鬻之矣。旧有水明楼五楹，下瞰卫河，帆樯来往栏楯下，与外祖雪峰张公家度帆楼，皆游眺佳处。先祖母太夫人夏日每居是纳凉，诸孙更番随侍焉。”^[6]（P773-774）书中的许多故事即由随侍过程中获得，如《槐西杂志一》中其十岁时亲眼所见的一则义叟质田赎人而终得善报的故事^[6]（P774）。而有的运河故事则是从祖母、母亲、亲戚、乡邻处听来。《槐西杂志一》记载的一则一个沧州人逼其弟妇改嫁并卖两侄女而遭报应的故事，即纪昀从母亲处听来。故事发生在雍正甲辰、乙巳年（1724、1725），纪昀刚刚出生^[6]（P774）。这些或亲历、或所见、或所闻的故事和传说，充斥着纪昀的童年生活，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对世界的认知，不仅为他日后的写作积累了素材，其中所蕴含的民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朴素观念也奠定了《笔记》的思想基调。

（二）大运河文化为《笔记》提供了题材来源

大运河与故乡不仅与纪昀的童年相伴，在其之后的人生经历中亦时常在场。1740年，纪昀17岁时自京师返回故乡应童子试，并结婚；1743年，就读于家乡的舅舅家，生长子汝侑；1744年，应河间科试，拔头名秀才入河间郡庠；1745年，应河间岁试；1750年，母亲张夫人去世，纪昀返乡守制，并得《埤雅》一部，并对鬼怪故事产生兴趣；1764年8月，父亲去世，返乡守制，筑对云楼；1766年，仍守制，修《纪氏家谱》，并撰《景城纪氏家谱序例》，居家乡直至1767年春守制期满回京^[7]。仅从这些简略的梳理就可以看到纪昀一生与大运河的密切关联。不仅如此，纪昀笔下的大运河故事不只局限于故乡的运河，而是涉及整个运河流域。一来因为运河中往来的船工即为故事传播的媒介，二来在纪昀出任学政、宦游期间也多次泛舟运河。大运河成为纪昀熟悉且感受深刻的地理景观，也就很自然地进入到他的心中、笔下，于是，我们看到《笔记》的题材大量来自于大运河流域。有如上文所述来自故乡运河的故事，也有流域内其他府郡如扬州、德州、静海、苏州、杭州等地的故事。《如是我闻三》所书从苏州舟至沧州，与会吟诗的风雅鬼邂逅。其余还有《滦阳消夏录二》中扬州人罗两峰目能视鬼；《滦阳消夏录四》中德州纪家庄一人夙孽遭报应被虱子咬死；《槐西杂志一》中发生在杭州涌金门神祠中河神与两鬼的对话……此等故事不胜枚举。同时，因为大运河连接五大水系，那些流域的故事传说也搭乘着运河的流波抵达纪昀的笔下。《槐西杂志三》就记载了一则淮河流域的故事，说的是朱某迷恋上淮河边上的一个妓女，为其挥金如土，馈赠颇丰，两个多月后暂去扬州。妓女久候不至，遂欲携款从良，却发现以前朱某所赠均不见，只剩下够支付那两个多月酒食的银两。有人说，是朱某的一位狐精朋友替朱某报复妓女。《滦阳消夏录一》所载则是范蘅洲渡钱塘江遇先知先觉的和尚的故事……

这些或因运河而生或借运河而传的故事在书中比比皆是，如抽去这些内容，《笔记》将不复存在，从这个角度讲，《笔记》可以说是大运河上漂来的一部书。

（三）大运河文化介入了《笔记》主题的生成过程

大运河流域处于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大运河文化虽呈现出多元共存的样态，但其共有的核心内容居于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精神内涵均可在儒释道三家那里找到渊源。大运河文化的思想构成呈现为儒家思想是主导，佛教观念、道教观念为辅助，三者的统一是其抹不去的底色。这些均投射到《笔记》的主题上。

纪昀思想复杂，但儒家思想是其核心。他在《槐西杂志一》中写道：“道家言祈禳，佛家言忏悔，儒家则言修德以胜妖，二氏治其末，儒者治其本也。”^[6] (P773) 可见在纪昀的价值体系当中，儒家思想所提倡的道德修养是完成自己社会理想的根本手段。儒家注重伦理道德、提倡人伦教化的特点在《笔记》中得到鲜明的体现。《笔记》虽题材包罗万象，主题复杂，然“劝善惩恶”是其主要的创作旨归。盛时彦在《阅微草堂笔记·序》中说：“《滦阳消夏录》等五书，俶诡奇谲，无所不载，洸洋恣肆，无所不言。而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8] 明确指出了纪昀的创作意图。全书彰显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宣扬因果报应的宿命思想，这种劝戒之心虽不免含有历史的糟粕，但也表现了儒家知识分子的一种社会责任感。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在南北朝的战乱时代因时而兴，迅速成为中国除儒教外第一大思想体系，及至明清，佛教对于普通民众的影响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佛教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大运河流域也概莫能外。《笔记》中大量的复生故事、因果报应的故事均可视作这些观念的形象化，并成为教化的手段。同佛教一样，道教思想在《笔记》中的作用主要是辅佐居于核心地位的儒教思想。道教作为根植于中国本土的宗教，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结合得更加紧密，在书中，道家的修炼并不与儒家的修身相冲突，如《滦阳消夏录二》中小狐狸们修道成仙的基础就是要读圣贤书，《滦阳续录三》中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仙侣都在诵读经书，皆可见一斑。

三、《笔记》光大了大运河文化

（一）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大运河流域的风土人情

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看，“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客观地理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广泛展示了各类地理景观：情趣景观、阅历景观、知识景观。”^[9] 《笔记》之于大运河正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笔记》虽用笔简练，但仍生动呈现了昔日运河令人心怡的自然美景，如：“帆樯来往”“洪波直泻，汹涌有声”，河岸的佟氏花园“三面环水，林木翳如”等等。《笔记》中还描述了运河流域大量的民俗民情，形成了一幅幅生动的风俗画卷，如对城隍神的崇拜和信仰、热闹的庙会、神秘的扶乩等等，为后人绘制出清中期大运河流域可触可感的生活图景，城隍神是中国民俗信仰中的城市保护神，是民间普遍信奉的俗神之一。《姑妄言之》中记载的一则运河上粮船搁浅后演戏祭神，冤魂附身向运官伸冤未果，城隍神终将凶手惩处的故事，可见城隍神在运河流域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扶乩在明清时期盛行，士农工商几乎事无巨细都要先问乩仙而后定，运河流域亦然。《笔记》多有记载，如《滦阳消夏录五》的一则沧州樊氏扶乩，乩仙降乩，怒斥回护己恶之人，实现了扶乩的劝惩功能。

纪昀不是简单地记录民俗事象，而是借助故事表现民风民情，实现其扬善惩恶的教化目的，在这一过程

中，大运河流域人的精神气质，仁厚、侠义、智慧、风雅等得以充分体现。如《槐西杂志一》所载一则沧州盲人救助路过的进京候补官员陈某，陈某获职后又报恩在沧捐建养瞽院的故事，盲人的古道热肠，陈某的知恩图报都堪称义举；而《姑妄言之二》中那则“沧州南一寺庙众僧于运河中打捞沉水石兽”的故事，在批评道学家读死书的同时，高度赞扬了那位老河兵的实践智慧。如此等等。

《笔记》充分发挥了文学的写人、记事、绘景生动、具体、形象的优势，用白描之笔呈现了大运河流域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民俗风情、历史故事、鬼狐传说，凸显了大运河文化的固有特征，也唤起了大运河流域人的浓浓乡愁。

（二）对研究大运河文化具有史料价值

《笔记》乃“著书者之笔”已是学界共识，小说中有大量的故事包含与运河相关的史实，如《姑妄言之》载：“乾隆三年，运河水浅，粮艘衔尾不能进，方演剧赛神，运官皆在。”^[10]由此可知，1738年运河的水势情况、漕运情况以及当时船只搁浅后船工的生活。《槐西杂志三》记载：“余乡产枣，北以车运京师，南随漕船以贩鬻于诸省。土人多以为恒业。”^[11]短短一行字，就告诉我们崔庄产枣的历史、枣的销路、当地人从业情况、运河彼时仍发挥漕运功能等等。小说也有很多考证性的文字，旁征博引，论证严谨，可与相关历史文献一起为认识、研究大运河文化提供可靠的资料。如《滦阳消夏录一》记载了康熙时献县人胡维华的造反，对参加者、所在地、计划起兵的路线、被剿过程均有精确描述。文字精炼，所涉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均交代明白无误。《滦阳消夏录五》详细描述了沧州酒的味道、取水、运输等情况。

（三）为大运河及其流域实地的文学景观建设提供了文学基础

文学景观指具有文学属性和文学功能的自然或人文景观，较普通景观多一层文学色彩、文学内涵。通过纪昀的生花妙笔，不仅大运河自身已成为著名文学景观，《笔记》中言及的度帆楼、水明楼、南川楼、插花庙、佟氏花园等处，均与生动的故事相联系，为复建这些景观提供了充分的文学基础。

四、结语

大运河与纪昀、与《笔记》密不可分，彼此之间脉络分明地呈现了“作家——地理——文学”的结构关系。大运河文化以纪昀为媒介，对《笔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运河是纪昀的生活家园，为《笔记》提供了素材来源，大运河又是纪昀的精神家园，影响了纪昀人生观、世界观乃至小说观的形成，大运河是《笔记》的文学源地之一。与此同时，作为文学经典《笔记》又汇入了大运河文化，丰富、光大了大运河文化的内涵，运用形象、生动、严谨、详实的文字，保存了历史的肌理，使大运河文化更鲜明更有温度。大运河文化与《笔记》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 [1]曾大兴. 文学地理学概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2]张翠英. 大运河文化[M].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9.
- [3]（清）纪昀. 景城纪氏家谱[A]. 纪晓岚文集[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 [4]童庆炳，程正民. 文艺心理学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 [5]（清）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四[M]. 韩希明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6]（清）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一[M]. 韩希明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7]何国松. 纪晓岚传·纪晓岚年谱[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
- [8]（清）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原序[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9][英]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M]. 杨淑华，宋慧敏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0]（清）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姑妄言之[M]. 韩希明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11]（清）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三[M]. 韩希明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4.

Study on *Fantastic Tales* by Ji Xiaolan and the Grand Can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Geography

FU Hong-mei

(Chinese Department, C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Cangzhou, Hebei 061001, China)

Abstract: *Fantastic Tales* by Ji Xiaolan is a collec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notes and strange stories written by Ji Yun, a famous Confucian in the Qing Dynasty, in his later years. It records what Ji Yun and his friends experienced, saw, heard and felt. The Grand Canal is an important writing object of *Fantastic Tales*, which provides a large number of writing materials for the author, and influences the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work. At the same time, *Fantastic Tales* by Ji Xiaolan is an important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e, which enriches the Grand Canal culture in retu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geography, *Fantastic Tales* by Ji Xiaolan has formed a clos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Grand Canal culture.

Key words: *Fantastic Tales* by Ji Xiaolan; Grand Canal culture; Literary Geography

作者简介：付红妹（1965-），女，河北沧州人，沧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美学。

[责任编辑：张胜广]